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8)07-0091-05

日本侵华新闻史中的一个特异人物

——佐藤善雄在华活动考察

□ 刘爱君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长春,130024)

[摘要] 佐藤善雄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活跃在中国东北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既担任过《盛京时报》的主编,又是日文报纸《奉天新闻》的创刊者。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反战言论遭到来自日本军部的强大压力,最终导致了《奉天新闻》的停刊。

[关键词] 侵华时期;日本记者;佐藤善雄;反战言论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政府“经营满洲”政策的不断深入,日本在我国东北陆续发行了大量报刊。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发行的调查资料记载:“在支那用华文报纸进行宣传工作方面,日本是最成功的。”^[1]

佐藤善雄是当时活跃在中国东北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1906年至1918年,担任过东北地区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主编和发行人;1917年创刊日文报纸《奉天新闻》,自任社长兼主笔;1921年日本在华创办最早的东方通信社在奉天设立分社以来,佐藤一直担任奉天分社的社长,1926年东方通信社与国际通信社合并为日本新闻联合社后,由佐藤出任奉天支局长直至1931年末。据日本《通信社史》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军部意欲将事件扩大,外务省(奉天总领事馆)持反对立场,而佐藤与奉天总领事馆关系密切,并且相当熟悉

中国的情况,一直对中国方面持理解态度,导致关东军的极大不满。迫于军部压迫,佐藤不得不辞去新闻联合社奉天支局长的职务,返回日本。”^[2]

对于日本侵华新闻史上的这样一位特异人物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日本媒体及报人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和日本军部、外交部、媒体对华态度的异同点。

从上海到奉天

1885年2月,佐藤善雄出生在宫城县名取郡生出村(今仙台市)一个医学世家。10岁时开始学习汉文,父亲希望其子承父业,但是佐藤中学毕业后却选择了中国。1903年8月,佐藤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我中学毕业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的4

[收稿日期] 2008-5-10

[作者简介] 刘爱君,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本侵华新闻史研究”(06CXW002)

月，那正是日俄开战的前一年。而3年前的1900年，由于支那拳匪骚乱，致使西太后和光绪帝蒙羞逃出京城，紫禁城遭到各国列强的蹂躏，支那国运衰落至极。加之北方列强俄罗斯侵占满洲地区，其魔爪延伸至朝鲜半岛，东洋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在时代的大潮面前，作为血气方刚的日本青年怎能无动于衷？岂可在国内依靠父母安心就学？况且邻邦支那的衰亡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命运，正所谓‘唇亡齿寒’，岂能坐视不管？如何挽救支那这一老大帝国，当时众多的日本青年怀抱着志在支那大陆的一腔热血。”^[3]

佐藤善雄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普通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佐藤善雄来华的1903年，正值日俄开战前夕，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严惩俄国的时候到了，国内外情势和舆论刺激了众多日本青年的“爱国心”和对中国落难的“侠义心”。佐藤善雄也不例外。

然而，“以培育中日英才，树立中国富强和中日提携之根本”为建校宗旨的东亚同文书院，在愈演愈烈的中日关系中，书院实质上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帮凶。战后，书院被称为间谍学校、殖民学校，书院出身的人在日本也受到鄙视。对于当年那些燃烧着爱国热情和行侠仗义之心来到中国的日本青年学生来说，这实在是战争带来的讽刺和不幸。

佐藤善雄在同文书院度过了三年的学习时光，于1906年毕业。同年12月，佐藤善雄正式进入《盛京时报》社。

从《盛京时报》到《奉天新闻》

《盛京时报》于1906年10月由中岛真雄在奉天创办。创刊初期以宣传报道日本的“满洲经营”国策为中心内容，着重强调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指出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教卫生等各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的建议。特别是大篇幅介绍日本的维新改革，宣扬只有日本才能真正指导中国的内政。就佐藤善雄个人而言，他认为在华办报的目的，应该是“代表

日本向中国介绍本国的情况，表达日本的愿望以求得中方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有助于两国亲善”。^[4]然而长期以来，佐藤一直感到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成为佐藤善雄创办《奉天新闻》的导火索。

当时，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日本国内的报刊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日本在华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报刊《顺天时报》和《盛京时报》，也不遗余力地为日本政府摇旗呐喊，一时间成为中国各界有识之士的众矢之的。面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以及列国对日本的怀疑，佐藤认为其原因完全在于将中国作为属国对待的日本政府，是日本提出无理要求，自取其辱。于是，佐藤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奉天创办一份日语报纸，“首先将中国方面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让日本加深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似乎更为重要”。^[5]

1917年9月，佐藤终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推出了日文报纸《奉天新闻》，并表达了自己的创刊设想：“日本若继续像今天这样抱有战胜国的优越感，凡事强迫中国接受的话，则难以长期保持两国间的圆满关系，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失败已经明确验证了这一点，若两国人士平日能够更加致力于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的话，日本就不会重复类似拙劣的外交事件”。^[6]《奉天新闻》创刊后，以向日本介绍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办报特点，力求客观中立地报道中国方面的消息，向日本传达中国官民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佐藤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自任社长兼主笔，以该报为阵地质疑日本的殖民政策，还经常登载中日双方关于两国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包括中方言辞激烈的批判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文章。

九·一八事变与《奉天新闻》的停刊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然而，关东军却对国内外记者宣称“中国军队突袭列车破坏铁路”。当时兼任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奉天支局长的佐藤善雄，负责向东京

总部发出第一条通报。于是，抱着内心的种种怀疑，佐藤在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上没有提到“中国奉天军队”，而使用了“似乎是匪贼组织”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但事变后日本军方为封锁真实情况，对媒体开始实施严格审查，佐藤的这份电报激怒了关东军。结果，不但报道被扣押无法传至国内，而且成为佐藤“违背军方意图”的重大罪状。随着来自军部压力的日益加大，佐藤善雄不得不辞去新闻联合社奉天支局长的职务，同时为躲避关东军的迫害，佐藤听从奉天总领事馆朋友的劝告，暂时回国。1931年11月，佐佐木健儿接替佐藤就任新闻联合社奉天支局长，积极配合关东军参谋总部策划在满州进行新闻统制。

佐藤善雄无奈回国后，《奉天新闻》仍在继续出版，但佐藤从此心灰意冷，对报道内容不再过问，报社经营也任由员工打理。实际上，回到家乡的佐藤并未摆脱军部的干扰，他和家人不断遭受便衣的跟踪、宪兵队的盘查，甚至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讯问。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以及日本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佐藤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完全失望，决意将《奉天新闻》停刊。

1934年，佐藤返回奉天着手停刊工作，却遭到当年为《奉天新闻》的创刊提供资金支持的诸多朋友和同事的反对，人们规劝佐藤为全家的生计和全体员工的出路考虑，与其与军方作对，不如委曲求全迎合军部，以求自保。佐藤虽然对多年苦心经营的报社心存不舍，但坚决不愿违心地向军方低头。当时，关东军已在奉天成立了“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作为新闻统制和舆论指导机关，1936年9月，又将满州的主要言论机关合并为统一管理下的“满州弘报协会”，只有加入该协会才能享有“国通”提供的信息、广告来源及满铁补助金等，致使未加盟该协会的报社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并且随时有被取缔的危险，《奉天新闻》便是没有加入协会的报刊之一。为妥善处理报社和员工的善后事宜，佐藤滞留奉天经多方交涉，最终于1937年8月31日将报社售与《奉天日日新闻》

社，9月1日，发行了20年的《奉天新闻》正式停刊，佐藤将出售报社的资金作为解散费用分发给60余名员工，而后偕同家人返回日本。^[7]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关东军对东北的新闻统制不断加强，1938年11月，《奉天日日新闻》被满铁的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合并。至1944年春，东北新闻界在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整理兼并之后，日文报纸只保留了《满洲日报》和《大连日日新闻》，中文报纸则统合为《康德新闻》。

佐藤善雄的反战论

1.《奉天新闻》的反战主张

《盛京时报》和《奉天新闻》是佐藤善雄在华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舞台，从两份报纸的内容来看，1915年以后的《盛京时报》明显地沦为宣扬日本对华政策的御用报刊，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而《奉天新闻》则较为客观中立地报道两国事件，对于两国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并非一味宣传日本的方针，而是希望向日本传达中国方面的声音，还时常对日本的大陆政策表示质疑，并提出一些改善中日关系的方案。因此，佐藤创办《奉天新闻》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思想的阵地。

例如，就日本舆论宣传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不取满蒙则日本必亡”的论调，1931年1月，《奉天新闻》首先连载反映日本对满方针的文章《帝国在满蒙的地位》^[8]。同年6月，又在头版大篇幅连载了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警察总监吴铁城的署名文章《满洲的日本特殊权益否定论》，严厉批驳了日本的主张。文中指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日本利用历史、外交和现实的原因导致的所谓继承权和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金融机构，以南满铁路为中心不断扩大侵略。甚至将东四省的名称也擅自更改，视东北为日本人的东北……在治安方面口口声声要代替中国维持地区安全，简直是喧宾夺主，是对中国主权的藐视。至于日本的经济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我国

国民生活的基本物资……金融、工业、商业及进出口等等均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可以说日本人扼住了我们的咽喉”^[9]、“日本必须放弃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我们否认一切日本与第三国之间签订的针对满蒙地区的协定……必须唤起东北各省民众反抗帝国主义者中最为强暴阴险的日本及俄国”。^[10]

对于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佐藤也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任何民族都拥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殊的语言和风俗,也拥有本国的民族自尊心,这是用任何手段都不能轻易抹去的。……我国为获取殖民地找出了各种原因,如我们在文化上比殖民地民族优秀,可以影响殖民地地区的发展啦,出于国防上的需要,我国必须领有该地区啦,等等。以这些理由占有殖民地使之成为我国的牺牲品,这在政治道义的观念上是绝不允许的,无数实例已证明殖民地政策绝不会取得圆满的效果。”^[11]

面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奉天新闻》登载了一系列改善的建议,如在《改良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态度的方案》中提出,“改良的要点是以人类平等为大义、以博爱为宗旨,尊重友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歧视中国人,而应抱有尊敬之心以礼相待;改正称呼等其他用语;在官府等公共机关、公司、商店、学校、家庭及路上,无论男女老幼均应改善对待中国人之态度,以亲切的同情之心相处;改善目前内地的留学生待遇法规”^[12] 等等,并且指出两国交恶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将中国人视为劣等国民百般轻蔑,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看不到中国人的长处”。^[13]

2. 佐藤善雄的反战理由

通过在中国的长期生活和对中日两国关系、前途的思索,佐藤善雄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战思想。佐藤的观点主要集中在针对日本军部的盲目自大、对中国的无知等方面,他认为军部的政策不仅不能捍卫国家利益,反而将带来亡国的危机。因此,他的反战论不是基于国际正义等抽象的概念,而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冷静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其

中国观是反战论的来源和基础,反战论是其中国观的反映。佐藤在回忆录中这样总结自己反对军部的理由:

“当时,针对我的军部政策反对论,有人认为我是基督教徒,所以主张和平主义反战思想,也有人说我是赤色分子,所以反对日本的国策,等等,用各种说法中伤我。但事实上,我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军论者,只因军部的政策实属杜撰,过于离谱,不仅于国家无益,反而祸国殃民,我只是基于这种判断而反对。”^[14]

“日本与支那交涉已近百年,然而无非是‘舍利取权’,绝没有在支那获取半点利益,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却因此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汉民族看上去均是平和之民众,而事实上却具有强韧的性格,坚忍不拔,是一个不驱逐外敌誓不罢休的可畏的民族。日本若想统治一时或一部分地区,正如孩童欲统治老人一般,结局只能是小胳膊拗不过大腿”、“支那几乎未见矿山和石油,即使多少有一些铁矿和煤炭,也无法满足其国内的需要,加之支那贫民人口众多,单单为他们提供粮食就会成为巨大的负担,实际上我们将一无所获。若取满蒙反倒作茧自缚,或是为救济支那计。”^[15]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佐藤基于对中国的了解,同时站在考虑日本利益得失的现实观点上,对军部的对华侵略政策进行了批驳,对一般国民来说极具说服力,因此遭到军部的严厉压制。当然,不可否认,上述言论也表明佐藤思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他的反战论归根结底只是站在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角度,缺乏广阔的国际视野。但是,在战争年代面对军部的压力,佐藤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表现出了日本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良知和勇气,值得关注和肯定。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发行的日系报刊几乎都是为日本政府宣传大陆政策服务的,在本质上可以说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吹鼓手。当然,这些

报刊在发行初期也曾经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在某些时期日本报人中也出现过少数具有反战思想的新闻记者。但是，他们反映真实、质疑现实的声音最终被日本的大陆政策、被媒体煽动下的全民狂热所淹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大报社慑于军部的威胁几乎完全追随军部的论调，以致形成了举国支持战争扩大的舆论氛围。同样，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报社的反应愈发狂热，纷纷主动迎合国家政策，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军部的要求。诚然，军部的谋略、对新闻的控制、在乡军人会的不买运动，等等一系列因素是造成日本报纸完全转向的主要原因，但各报社利用事变的发生展开报道战，为扩大自己的发行量积极主动地配合军部，新闻媒体已成为一意扩大战争的军部的共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言论机关和新闻记者，其使命感、正义感和勇气的缺乏才是将国家引入泥潭的真正原因，错误的新闻导向和失去理性的对华政策使日本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主张侵华的日本媒体的喧嚣中，佐藤善雄的反战论和中国观堪称不和谐音，因此遭到军部的严厉压制。尽管佐藤不惜以弃笔沉默来表明无言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动放弃了履行记者的职责和使命。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观察和对中日问题的思考，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界为数不多的真知灼见，在全国上下侵华一边倒的形势

下，准确地预见了中日关系的走向和前途，向日本人敲响了警钟。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被政府所采纳，但在今天仍然可以为中日两国正确了解和认识历史、促进民族和解提供宝贵的借鉴。如何从媒体与战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是我们思考中日关系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也是今后积极构建两国美好未来的基石。

注释：

- [1] 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支那における新聞發達小史》，1927年，第47页。
- [2] 池田一之《記者たちの満州事変—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の転回点》，人间科学新社，2000年，第39页。
- [3] [4] [5] [6] [14] [15] 佐藤善雄《新浪人の人生記》，编集中心株式会社，1972年，第34页，117页，117页，117页，177页，173页。
- [7] 据佐藤善雄回忆录《新浪人の人生記》，佐藤在奉天期间于1925年信奉基督教，回国后在家乡从事基督教传道。
- [8] 奉天新闻，《満蒙に於ける帝国の地位》，1931年1月28日~1931年2月1日。
- [9] [10] 奉天新闻，《満洲に於ける日本の特殊権益否認論》，1931年6月11日、6月12日。
- [11] 奉天新闻，社论《殖民地教育について》，1920年2月9日。
- [12] 奉天新闻，《支那人に対する日本人の態度を改良する方案（下）》，1920年3月18日。
- [13] 奉天新闻，《日支国交改善の根本（三）》，1920年4月1日。

A Review on Yosio Satou's Activity in China

LIU Ai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Yosio Satou, who was the editor in chief of Shengjing Times and the founder of the Japanese newspaper Mukden News, acted actively in the pres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o the 1930s.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he got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Japanese military because of his antiwar idea which resulted in the stop publication of Mukden New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Japanese Journalists, Yosio Satou, Anti-war Idea

[责任编辑：刘小燕]